

制造业服务化、政府补贴与企业绩效

刘畅, 马永军

(湖南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制造业服务化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 制造业服务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绩效, 并且政府补贴在其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 政府补贴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经验丰富企业和沿海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 充分考虑企业特征差异和构建合理有效的政府补贴机制是提升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制造业服务化; 企业绩效; 政府补贴

中图分类号: F4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980X(2019)12—0083—07

经过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 传统制造业发展中的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和低效率等问题日益突出, 制造业改革的呼声愈发强烈。目前, 中国经济出现的结构性减速也预示着以往依赖初级要素的传统制造业模式已难以为继, 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业、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而制造业欲完成服务化转型, 本质上承受着创新能力以及经济组织的门槛性制约, 但服务化的演替完成后也可以达到增长的阶段性变化, 如 IBM 等典型案例。制造业服务化战略的实施, 不仅能使企业从服务提供中获得额外的现金流, 而且有助于产品实现差异化, 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 制造业服务化的推行, 宏观上是制造业经济增长的突破点, 微观上是制造业企业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标志点。为此, 《中国制造 2025》特别指出, 要“加快制造与服务的协同发展, 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 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将发展服务型制造业作为制造业发展的一项任务。但与此同时, 一些传统制造企业向服务化转型失败的案例也不时出现, 美国贝恩公司调查结果显示服务化转型成功企业占比约 20%。可见, 制造业服务化绩效问题是当前经济学界值得研究的热点课题。

从制造业服务化效果来看, 现有相关研究大体分为三类:

(1) 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正效应。如 Arnold 等^[1]基于十个非洲地区国家的制造业样本, 以企业是否得到电信、金融和电力服务衡量服务部门的革新水平, 发现其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Baines 等^[2]认为制造业服务化战略是一种组织管理上的再创造, 转型后的制造企业以出售服务内容为主, 从而获得更大收益。刘斌等^[3]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不仅提升了中国制造企业的价值链参与程度, 而且显著提高了我国制造企业在世界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周杰等^[4]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直接的积极影响。王思语和郑乐凯^[5]基于 WIOD 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制造企业出口服务化会显著提升出口复杂度。

(2) 制造业服务化具有负效应。Oliva 和 Kallenberg^[6]发现在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 市场接受度、风险成本和组织管理等多方面的干扰因素, 使得战略预期目标难以实现。Gebauer 等^[7]采用案例分析法, 发现大多数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过程中会遇到“服务化陷阱”问题。因此, 一味地拓展服务业务, 必将增加企业转型成本, 却未必能为企业获得高回报。Antioco 等^[8]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

收稿日期: 2019—11—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府补贴机制调整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提升研究”(17CGL009); 中国包装联合会“绿色包装与安全”专项研究基金项目“基于服务型制造理念的包装产业转型路径研究”(2017ZBLY08);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项目“生产率目标下新兴产业政府补贴机制的优化研究”(XSP17YBZC045);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新常态下政府补贴机制优化与湖南省新兴产业生产率提升研究”(17C0507)

作者简介: 刘畅(1996—), 男, 广东韶关人, 湖南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创新战略、企业管理; (通讯作者) 马永军(1984—), 男, 河北邯郸人, 博士, 湖南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学、产业政策。

效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Neely^[9]、Kastalli 和 Van Looy^[10]发现服务化战略会导致制造企业绩效降低,且破产概率也会上升。肖挺^[11]以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实施服务化的制造企业,其绩效并未显著高于未实施服务化的制造企业。

(3)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如姜铸和李宁^[12]研究发现,当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越高时,服务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周念利等^[13]研究发现制造业中间投入服务化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相关关系。陈丽娴和沈鸿^[14]采用PSM-DID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制造业服务化绩效的正向影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态势,其中民营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后,企业绩效提升最为显著。夏秋和胡昭玲^[15]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投入增加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

综合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还未在学界达成一致意见,并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制造业服务化绩效与某些调节变量(制度环境、企业创新能力、行业竞争程度)相关。实际上,制造业服务化意味着传统制造业由单一的产品市场进入到“产品+服务”市场,企业需要加大研究开发费用、品牌运作等服务要素的投入,企业的财务状况受到极大挑战。此时,政府补贴等财政激励政策在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的作用凸显。那么,政府补贴能否真正改善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政府补贴影响制造业服务化绩效的机制如何?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又是否会因为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处地区、企业经营年限等因素的差异而发生改变呢?很显然,只有深入分析政府补贴在制造业服务化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才能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准确回答。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将为中国传统制造企业向服务型企业成功转型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本文接下来将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机制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对制造业服务化、政府补贴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考察。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传统制造企业以生产和组装产品为主,而制造业服务化战略意味着企业价值链向上游和下游延伸,此时企业更加注重研发设计、售后服务与品牌运作等高获利环节^[15]。与传统制造企业相比,服务

型企业构筑起企业与客户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通过稳定的顾客粘性来抵御外部竞争,这样的特殊内在关系犹如企业获得了社会资本。在产品方面,制造业服务化使得产品更具差异性,且不同企业存在地区性、规模性、产权性质等差异,其所需要实施的服务化内容也有着很大不同,这使得竞争对手不能通过简单的模仿从而削弱服务化战略的竞争优势。此外,服务化战略使企业可以更高效地掌握客户的需求,有助于建立信息优势,对产品制造化内容和服务化内容进行合理的改造升级,实时适应市场变化。当产品的使用较大程度依赖于服务内容时,制造业服务化可以实现与客户之间的利益捆绑,该情况下客户也会有着较强的黏性^[16]。企业采取的服务化内容有产品的安装、维修、保养和升级等方面抑或是能提高企业差异性竞争力的金融、物流和营销等方面,这使得收入更多元化^[17],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积极作用,进而更有助于企业利润水平的提升。

“服务化悖论”也是制造业服务化研究的主流观点之一,主要在于服务化很容易导致企业运营成本和管理难度的上升。首先服务化战略的实施会导致企业内部组织架构的变动,原本长期适应的组织管理模式受到冲击,制造业内部原有部门有可能会因为服务化战略所带来的资源分配和职能分割等威胁私利的现象,进而表现出对服务化战略的抵触,随之会产生政治成本。其次,制造业服务化在产品的基础上提供服务项目,对市场消费者有着直接影响的便是价格的提升,但服务化项目却未必能吸引消费者,因此在接受度低的情况下,对企业利润会有着负面的作用。最后,服务化战略的推行需要企业持续不断地对市场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以确定服务化产品的定位和更新,这也将导致信息成本的攀升,企业绩效也会因此而被抑制。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为探究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正负效应的主导地位,本文提出如下两个竞争性假说:

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H1a);

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H1b)。

1.2 政府补贴对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影响

制造业实施服务化意味着传统制造企业价值

链向两端延伸,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研发设计、信息技术、营销管理、售后维护等优质服务要素的投入^[18]。因此,雄厚的资金支持成为制造企业能否实施和更好实施服务化的首要条件。此外,服务化通常周期长、风险大,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之后才能显现效果,服务化过程中如果无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服务化效果可能无法得到保障,甚至服务化转型可能会失败^[19]。政府对企业进行无偿性的资金帮助,通常是希望能以此帮助企业合理投资、加快技术改革和理性扩张规模等。政府补贴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强企业现金流的充裕程度,进而能更多地进行针对性投资。政府补贴也可以作为一种积极的信号,使得企业更容易在金融市场上获得外部融资^[20]。因此,对于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企业,一方面,可以扩大服务化所需的资金支持,其服务化战略的发展布局在规模和类别上都不会因资金不足而被束缚,进而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另一方面,企业更有能力引入前沿设备,促进服务化内容的创新和实现,而且对市场调研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也能提高,从而保证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方向更准确,以维持企业绩效的平稳上升。据此得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补贴在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H2)。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取了2011—2018年的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结合CSMAR与Wind两大数据库。其中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剔除了ST公司样本;删除了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ize处理。最终获得了6373个观测值。

2.2 模型建立和变量说明

为了验证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如下检验模型:

$$eps_{it} = \beta_0 + \beta_1 ser_{it} + \beta_2 debt_{it} + \beta_3 leverage_{it} + \beta_4 growth_{it} + \beta_5 fage_{it} + \beta_6 size_{it} + \epsilon_{it} \quad (1)$$

其中:*eps*代表企业绩效,其为基本每股收益指标,由净利润与总股本的比例衡量;*ser*代表制造业服务化,其由营业外收入与总收入的比例衡量;*i*代表样本个体,*t*代表样本年度。此外参照相关研究,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具体内容见表1。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企业绩效	<i>eps</i>	采用基本每股收益,即净利润与总股本的比例
制造业服务化	<i>ser</i>	营业外收入与营业总收入的比例
企业负债	<i>debt</i>	企业短期负债、长期负债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之和除以期末总资产
财务杠杆率	<i>leverage</i>	期末总负债减去短期负债、长期负债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再除以期末总资产
企业成长性	<i>growth</i>	营业收入增长率
成立年限	<i>fage</i>	企业成立年限加1后取自然对数,即ln(1+成立年限)
企业规模	<i>size</i>	期末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政府补贴	<i>sub</i>	补贴收入与销售收入的比

2.3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从表2中看出企业绩效的均值为0.313,其标准差为0.581;制造业服务化的均值为0.021,其标准差为0.048。其他变量的均

值标准差均在正常范围内,说明无明显样本偏误异常。表3中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且均值为1.08,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干扰。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ps</i>	6373	0.313	0.581	-3.860	14.580
<i>ser</i>	6373	0.021	0.048	0.000	0.382
<i>debt</i>	6373	0.199	0.162	0.000	0.712
<i>leverage</i>	6373	0.269	0.156	0.039	0.949
<i>growth</i>	6373	0.210	0.533	-0.653	4.740
<i>size</i>	6373	21.677	1.172	16.704	26.647
<i>fage</i>	6373	2.593	0.351	1.335	3.600
<i>sub</i>	6373	0.010	0.097	0.000	6.455

表3 方差膨胀因子

变量	<i>size</i>	<i>ser</i>	<i>leverage</i>	<i>fage</i>	<i>debt</i>	<i>growth</i>	<i>Mean</i>
VIF	1.15	1.11	1.1	1.06	1.05	1.01	1.08
1/VIF	0.873	0.901	0.905	0.944	0.949	0.994	

3 实证分析

3.1 全样本回归

在表4中,第(1)列为不加入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基本控制变量的模型回归结果结果;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了制造业服务化变量,其影响系数为1.85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是对假设H1a的支持,表明我国的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占据主导地位;*F*为94.75,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自变量联合起来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在控制变量方面,负债水平、财务杠杆率、企业成长性、企业规模、成立

年限的影响系数分别为-1.326、-0.641、0.148、0.149、-0.456,系数符号与第(1)列相符,且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负债水平、财务杠杆率和成立年限对企业绩效具有负效应,以及企业成长性和企业规模对企业绩效具有正效应。为检验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在原有模型中加入了制造业服务化与政府补贴的交互项 $ser \times sub$,在从第(4)列中可以看出,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为15.83,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是对假设H2的支持,表明政府补贴在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中呈现正向的调节作用。

表4 全样本回归

变量	(1)	(2)	(3)	(4)
<i>ser</i>		1.852*** (14.68)	1.930*** (14.57)	1.850*** (13.80)
<i>sub</i>			-0.968* (-1.93)	-2.342*** (-3.77)
$ser \times sub$				15.83*** (3.75)
<i>debt</i>	-1.321*** (-20.82)	-1.326*** (-21.34)	-1.319*** (-21.20)	-1.331*** (-21.39)
<i>leverage</i>	-0.558*** (-8.44)	-0.641*** (-9.87)	-0.643*** (-9.89)	-0.652*** (-10.04)
<i>growth</i>	0.144*** (14.79)	0.148*** (15.46)	0.146*** (15.31)	0.147*** (15.37)
<i>size</i>	0.119*** (8.20)	0.149*** (10.32)	0.150*** (10.37)	0.150*** (10.44)
<i>fage</i>	-0.406*** (-3.69)	-0.456*** (-4.23)	-0.455*** (-4.23)	-0.436*** (-4.05)
年度控制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970*** (-2.56)	-1.471*** (-3.96)	-1.485*** (-3.99)	-1.536*** (-4.13)
<i>N</i>	6373	6373	6373	6373
<i>R</i> ²	0.161	0.195	0.196	0.198
<i>F</i>	81.27***	94.75***	88.30***	83.56***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的数值。

3.2 稳健性检验

采用以下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被解释变量替代,本文中企业绩效变量是以基本每股收益来衡量,这主要考虑到本文的数据样本为上市公司。基于稳健性考虑,参考过往文献中的指标选取,企业绩效变量分别改用*roe*(净资产收益率)和*sale*(销售净利率)代替;二是交互变量替代,本文中使用补贴收入与销售收入的比值作为政府补贴的

代理变量,主要考虑到这一变量能更直观地反应政府补贴的影响。参考过往文献中的指标选取,政府补贴改用政府补贴额与总资产的比例来度量;三是回归方法选择,回归方法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回归结果的异常性变化,本文采用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代替固定效应面板回归。从表5中看出可以看出其结果并无明显差异,因此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表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roe	sale	eps	eps	eps
ser	4.232*** (8.23)	213.3*** (3.55)	1.342*** (9.40)	1.831*** (14.12)	1.806*** (13.89)
debt	-1.628*** (-6.43)	-178.3*** (-6.03)	-1.285*** (-30.56)	-1.328*** (-21.35)	-1.336*** (-21.45)
leverage	-0.850*** (-3.21)	-15.27 (-0.49)	-0.452*** (-10.30)	-0.642*** (-9.87)	-0.653*** (-10.02)
growth	0.186*** (4.78)	-6.013 (-1.32)	0.173*** (14.20)	0.148*** (15.47)	0.149*** (15.57)
size	0.184*** (3.13)	1.570 (0.23)	0.179*** (30.01)	0.149*** (10.33)	0.149*** (10.36)
fage	-0.116 (-0.27)	-9.852 (-0.19)	-0.0376* (-1.94)	-0.457*** (-4.24)	-0.447*** (-4.15)
sub				0.673 (0.68)	-0.759 (-0.67)
ser × sub					23.89*** (2.49)
年度控制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5.310*** (15.66)	-3.088** (-2.04)	30.63 (0.17)	0.985*** (7.88)	-3.156*** (-24.19)
N	6373	6373	6373	6373	6373
R ²	0.0284	0.0118		0.195	0.196
F/chi ²	11.40***	4.660***	1857.60***	88.01***	82.64***

注: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的数值。

3.3 进一步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政府补贴对制造业服务化和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本文将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分别按照企业的产权性质、企业经营经验和企业所处地区进行分组。产权性质按照最终控股人是否为国有区分,这一分组主要是考虑到我国国情,以及国有企业相较于民营企业在补贴的获取上有更大的优势;企业经营经验通过企业成立年限是否大于10年分类,这主要考虑到企业成立时间越长则对自身特征有着越清晰的了解,有着更为优化的投资决策能力,因此本文将成立年限大于10的企业归类为经验丰富的企业,此外的样本则属于企业经验不足分组;通过样本企业所在省市是否属于东部沿海地区进行分组,其中东部沿海地区为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一分组主要顾虑到企业所处地区的发展程度高低对企业经营发展有不同的影响。以上三类分组的回归结果可以观察企业特征不同,政府补贴在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是否也会有所不同,通过对三组分别进行回归得出结果(表6)。

表6 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按企业所有制分组		按企业经营经验分组		按企业所处地区分组	
	(1)	(2)	(3)	(4)	(5)	(6)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经验丰富企业	经验欠缺企业	沿海地区企业	非沿海地区企业
ser	1.948*** (13.70)	1.292*** (4.52)	1.934*** (12.78)	1.763*** (5.91)	1.220*** (6.87)	2.298*** (11.18)
sub	-1.389* (-1.83)	-3.040*** (-3.01)	-2.001*** (-2.59)	-1.836* (-1.72)	-1.985*** (-2.49)	-2.196** (-2.18)
ser × sub	3.605 (0.65)	30.70*** (4.62)	14.98*** (3.15)	-22.74* (-1.69)	12.83* (1.83)	13.23** (2.25)
debt	-1.183*** (-15.49)	-1.626*** (-15.86)	-1.371*** (-17.93)	-0.865*** (-6.25)	-1.400*** (-18.11)	-1.324*** (-13.21)
leverage	-0.619*** (-7.71)	-0.853*** (-7.99)	-0.749*** (-9.46)	-0.582*** (-3.92)	-0.739*** (-8.26)	-0.673*** (-6.88)
growth	0.143*** (13.06)	0.156*** (9.30)	0.130*** (11.54)	0.213*** (11.02)	0.150*** (12.22)	0.143*** (9.61)
size	0.108*** (6.35)	0.221*** (8.99)	0.148*** (8.31)	0.153*** (4.18)	0.207*** (10.52)	0.119*** (5.53)
fage	-0.318*** (-2.45)	-0.588*** (-3.30)			-0.615*** (-5.28)	-0.187 (-0.89)
年度控制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962** (-2.24)	-2.586*** (-3.99)	-2.462*** (-6.49)	-2.635*** (-3.47)	-2.314*** (-5.07)	-1.433** (-2.21)
N	3384	2989	4669	1614	3671	2702
R ²	0.243	0.181	0.196	0.251	0.217	0.197
F	54.09***	37.25***	62.81***	22.44***	52.56***	36.12***

注: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的数值。

从表6可看出,在产权性质分组中,第(1)列民营企业分组中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为3.605,但却不能在10%水平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制造业服务化变量的影响系数为1.948,且能在1%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这表明政府补贴未对民营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究其原因,制造业服务化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还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更大。因此,在拿到补贴的情况下,开展服务业务创新的动力仍然不足,从而使得政府补贴未真正发挥作用。第(2)列国有企业分组中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为30.70,且能在1%水平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制造业服务化变量的影响系数为1.292,且能在1%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这说明在国有制造企业中,政府补贴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异常明显,但是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水平却明显低于民营企业,这间接表明了国有企业制造业服务化的正向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依赖于政府补贴的帮助,而国有制造业服务化的绩效促进作用并不理想。

在企业经验分组中,第(3)列经验丰富分组中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为14.98,且能在1%水平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制造业服务化变量的影响系数为1.934,且能在1%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第(4)列经验不足分组中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为-22.74,且能在1%水平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制造业服务化变量的影响系数为1.763,且能在1%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这说明在制造业服务化的推行过程中,企业内部长期累积的经营管理经验极为重要,经验水平高的企业往往能更好地将政府补贴运用到合理的业务上以保证服务化战略的高效率高收益,而经验水平低的企业对政府补贴的运用却明显不当,放大了制造业服务化的弊端作用。

在企业地区分组中,第(5)列东部沿海分组中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为12.83,且能在10%水平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制造业服务化变量的影响系数为1.220,且能在1%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第(6)列非东部沿海分组中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为13.23,且能在5%水平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制造业服务化变量的影响系数为2.298,且能在1%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说明政府补贴在非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制造业服务化战略中对企业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要大于东部沿海地区,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完善程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准,制造业服务化战略所能带来的竞争力提升出现边际递减效应,而非东部沿海地区相对而言则更需要制造业服务化来提升企业绩效。

4 结论

本文将2011—2018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了制造业服务化的积极作用占据了主导地位。除此之外,基于深入检验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的目的,在模型中引入交互项。首先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为正,说明政府补贴整体上起到了正面积积极的影响;但从分组回归来看,发现在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中,民营企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性远低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远多于民营企业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这一点;经验丰富的企业对政府补贴的利用更到位而经验不足的企业很有可能将政府补贴投入到错误的服务化项目中,从而遭受负面影响;东部沿海地区可能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补贴的正向调节作用受到边际递减规律的影响而略低于非东部沿海地区。

基于本文内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对于制造企业来说,第一,制造企业在服务化过程中应注意组织管理上的和谐,并且加强市场调研和客户沟通以保证产品服务内容的市场接受度,并且加强制造业服务化战略的学习,制定出更契合自身的计划安排;第二,制造企业应适应客观规律,不能盲目追赶当下服务化发展潮流,在决定推行服务化战略前,要对所处的营商环境进行研究,考察其所具有的特异性再做决策。对于政府来说,第一,政府应适当放宽对民营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限制,从行政审批和税收政策等方面进行帮助,以保证民营制造业服务化的深度市场化;第二,政府在补贴发放过程中,应该坚持竞争中性的原则,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应当做到一视同仁,促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均衡发展,创建公平的营商环境;第三,在审批流程中要对企业资质能力等方面进行详实的了解,保证优质企业能获得补贴,杜绝对劣质企业的补助;第四,对于中西部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为了加快其服务化转型,政府应当适度加大资金补助力度,从而使得服务化战略的优势得到更好发挥。

参考文献

- [1] AMOLD J, MATTOO A, NARCISO G, et al. Services inputs and firm productiv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J].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006, 17(4): 578-599.
- [2] BAINES T, LIGHTFOOT H, BENEDETTINI O, et al. The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a review of litera-

- ture and reflection on future challenges [J].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9, 20(5): 547-567.
- [3] 刘斌, 魏倩, 吕越, 等. 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J]. *经济研究*, 2016, 51(3): 151-162.
- [4] 周杰, 薛有志, 尚志文. 制造企业服务化、技术创新产出与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7, 39(9): 46-57.
- [5] 王思语, 郑乐凯. 制造业出口服务化与价值链提升——基于出口复杂度的视角[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5): 92-102.
- [6] OLIVA R, KALLENBERG R. Manag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roducts to servic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2003, 14(2): 160-172.
- [7] GEBAUER H, FLEISCH E, FRIEDLI T, et al. Overcoming the service paradox i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23(1): 14-26.
- [8] ANTIOCO M, MOENAERT R K, LINDGREEN A, et al.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to and consequences of service business orientations i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8, 36(3): 337-358.
- [9] NEELY A. Exploring the finan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J]. *Operations Management Research*, 2008, 1(2): 103-118.
- [10] KASTALLI I V, VAN LOOY B. Servitization: disentangling the impact of servic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n manufacturing firm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3, 31(4): 169-180.
- [11] 肖挺. “服务化”能否为中国制造业带来绩效红利[J]. *财贸经济*, 2018, 39(3): 138-153.
- [12] 姜铸, 李宁. 服务创新、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 *科研管理*, 2015, 36(5): 29-37.
- [13] 周念利, 郝治军, 吕云龙. 制造业中间投入服务化水平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J]. *亚太经济*, 2017(1): 138-146, 176.
- [14] 陈丽娟, 沈鸿. 制造业服务化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和要素结构——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PSM-DID实证分析[J]. *经济学动态*, 2017(5): 64-77.
- [15] 夏秋, 胡昭玲.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成本和风险的视角[J]. *当代财经*, 2018(7): 99-111.
- [16] CUSUMANO M A, KAHL S J, SUAREZ F F, et al. Services, industry evolution, and the competitive strategies of product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6(4): 559-575.
- [17] WISE R, BAUMGARTNER P. Go downstream: the new profit imperative in manufacturing[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0, 28(1): 89-96.
- [18] 吕越, 罗伟, 刘斌. 融资约束与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跃升[J]. *金融研究*, 2016(6): 81-96.
- [19] 顾乃华, 胡晓丹, 胡品平. 融资约束、市场结构与制造业服务化[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3(5): 11-22.
- [20] 马述忠, 张洪胜, 王笑笑. 融资约束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来自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理论与证据[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1): 83-107.

Manufacturing Sertivizatio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Liu Chang, Ma Yong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Hunan, China)

Abstract: It is the main way for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through the manufacturing sertivization. Taking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isted compan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manufacturing sertivization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nufacturing sertiviz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n this process, government subsidy plays a 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Further analysis show that such positive regulatory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perienced enterprises and coastal enterprises. Therefore, the key to improve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s to fully consider the differences of enterprises' characteristics and build a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 subsidy mechanism.

Keywords: manufacturing sertivization; government subsidies; enterprise performance